DOI：10.13998/j.cnki.issn1002-1248.23-0801

网络圈群中风险感知对群体极化的影响研究

万小蝶，夏一雪[*]
（中国人民警察大学 网络舆情治理研究中心，廊坊 065000）

摘　要：［目的 / 意义］社交媒体中，由网络圈群效应引发的群体极化现象纷繁复杂，为网络舆情的引导和治理带来了严峻挑战。本文旨在探究网络圈层中多维度环境风险感知对群体极化的影响机制，对治理群体极化提供了理论支持。［方法 / 过程］基于保护动机理论以及圈群结构理论建立理论模型，以“6.10”打人事件为例进行数据采集，从随机群体和圈群群体两个角度得到两组对比数据，并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对研究假设进行实证分析。［结果 / 结论］1）与随机群体相比，网络圈群内观点同质化程度高，圈群效应显著；2）风险感知对群体极化现象的形成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风险反应行为对群体极化的影响更为显著；3）网络圈群对群体极化现象的形成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面”对群体极化的影响更为显著；4）网络圈群在多维度风险感知和群体极化间起中介作用。

关键词：群体极化；风险感知；网络圈群；结构方程模型
中图分类号：G206；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1248（2023）09-0066-14

引用本文：万小蝶，夏一雪. 网络圈群中风险感知对群体极化的影响研究[J]. 农业图书情报学报，2023，35(9)：66-79.

1 引　言

当前，伴随网络、信息、数字、智能等技术的快速发展，网络社会治理既面临技术赋能的机遇，又面临技术引发的挑战。网络群体极化作为一种复杂而频发的网络现象，随着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和网民群体数量的爆炸式增长，释放的影响力也越加广泛，深刻形塑并重构了从个体到群体的思维图式、表达结构及网络行为：一方面其偏激发泄、跟风盲从、煽动对立等特性催生了网络乱象；另一方面也具有赋能传播、强化引导、凝聚人心等积极意义[1]。由此，细致剖析网络群体极化的内部机制，对于营造清朗网络空间、推进网络社会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在网络空间中，个体往往通过个性化标签和符号在网络上寻找自己的情感专属地，通过网络这一渠道对发生的社会热点进行意见的交换与认同，并形成信息的“圈层传播”特质。这种网络集群行为现象中，网络圈群的主体复杂性、群体派别性、技术助推性以及圈层间文化的异质性[2]逐渐显露出来。在这些特性的加持下，圈群的存在为群体极化的发展提供了土壤，一旦出现争议事件，群体极化便快速生成。而个体是按照自己感知到的现实来行动的[3]，因此，从本质上来说，导致群体极化的根本原因是个体对风险的感知。

收稿日期：2023-08-16
基金项目：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大变局下重大国家战略网络舆情风险建模与防范化解机制研究”（HB23ZT040）
作者简介：万小蝶（1999-），女，研究生，中国人民警察大学，研究方向为网络舆情
[*] 通信作者：夏一雪（1983-），女，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网络大数据。Email：shujukexue2020@126.com

故本文从圈群效应中的风险感知视角入手探究群体极化的生成路径，以期为群体极化的治理提供理论基础。

“网络圈群”可以被看作为网民群体因某种特定原因通过互联网组合而成的虚拟聚合空间，代表着一种新型社会关系[4]，网络圈群化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国内学术界的研究角度可以分为网络圈群特征[5]、网络圈群与高校思想教育[6]、网络圈群与意识形态[7]这 3 个主要方面。在有关网络圈群特征的已有研究中，各学者从不同角度总结其特征，包括组织性、封闭排他性、对抗性[4]；主体复杂性、群体派别性、技术助推性以及圈层间文化的异质性[2]；类别多样性、成员关系高度强化性、封闭性[8]等，综合以上研究来看圈群主要特点都离不开圈内封闭的特性。网络圈群创设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传播的虚拟场域，成为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重要因素。网络圈群中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传播面临碎片脱序[9]、黑箱效应[10]、信息茧房[11]、信息加密[12]等一系列问题，如何构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虚拟场域的治理图景成为了部分学者的共同目标。网络圈群的加速形成，激化管理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网络意识形态风险的多发。首先，圈层的封闭性导致主流意识形态难以进入圈群[13]；其次，抽象的理性建构与具象性认知图式的差距，制约了认同生成[7]；最后，非主流意识形态融入网络圈群并衍生出新的传播权力[14]。

群体极化由现实映射到网络后，主要表现为“狂热追捧”与“千夫所指”反向共生、“道德审判”与“道德绑架”相互叠加、“口诛笔伐”与“人肉搜索”一触即发等网络样态，对网民价值观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群体极化成因错综复杂，涉及传播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领域，为了厘清群体极化的生成机制，众多学者对这一网络现象开展了深入研究。纵观国内外对群体极化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 3 个研究阶段，分别为萌芽期、发展期、成熟期。萌芽期，研究主要关注用户观点[15]、舆情动态[16]、信息扩散[17]、社交媒体[18]等，对群体极化形成的研究基本停留在理论分析阶段，但也为其后续的研究奠定了理论框架和发展基础；发展期，主要关注回音室效应、选择性接触、网民情感、舆论扩散等主题内容，很多学者认为社交媒体为政治参与和意识形态分类提供了新的平台，对社交媒体上政党和派别意识形态上的群体极化的研究集中在执政风险[19]、群体利益[20]、群体意识形态[21]等方面；成熟期，更多的学者加入到了群体极化的探讨中，主要通过建立模型和实证分析的方法探索群体极化的生成机制[22]、演化机理[23]、群体极化下的社会认同与心理机制[24]等，为群体极化的生成和演化提供了大量的技术支撑。

综上所述，学术界对网络圈群和群体极化现有研究成果颇多，但鲜有学者把圈群效应、风险感知以及群体极化结合起来探讨三者间的内在逻辑联系。而在网络圈群高中心势和沉默螺旋、去中心化和再中心化的作用下，群体的风险感知极易主导网络圈群内部的整体态度立场和思想认同并诱发极化行为。因此，本文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上，基于有圈群和无圈群环境下的女性对“6.10”打人事件看法的两种类型的数据对比，通过构建风险感知结构方程模型（SEM），探究圈群的存在是否对群体极化有正向影响以及圈群、风险感知与群体极化三者间的相互关系，以期为群体极化的治理提供借鉴。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2.1 理论分析

2.1.1 保护动机理论

风险感知是指个体在当下所处的环境下，对风险的主观评定和判断，及由此引发的行为决策与心理反应[25]。1975 年，由罗杰斯（Rogers）提出的保护动机理论认为，环境和个体中出现的威胁信息会引发个体的认知评估，从而调节态度的变化，其中主要涉及两个环节：威胁评估和应对评估。该理论认为，当个体感知到事物的威胁，意识到可以采取的有效行为措施时，就会认为自身有能力实施对事物产生积极影响的行动。本研究认为网民在面对涉及到自身利益或者涉及自身利益的未来可能性事件中，其行为演化为群体

DOI：10.13998/j.cnki.issn1002-1248.23-0801

极化的动机来自他们对威胁性的评价（利益关涉范围和社会事件的原因）和采取应对行为的效能评价（群体极化可能带来的损失以及采取应对行为可能产生的效能）。网民越是感知到面临的社会热点事件所带来的风险威胁，越是感知到自身的应对能力，其网络集群行为就越容易被激发。因此，鉴于罗杰斯的保护动机理论，并借鉴其他学者对风险感知的分类[26]，再结合本文的研究对象，把舆情风险感知划分为风险事实感知、风险损失感知和风险反应行为感知 3 个子维度。风险事实感知指网民对当前所面临社会问题的认知；风险损失感知指网民认为该社会问题可能会给自身带来的损失；风险反应行为感知指网民认为自身可以采取行动来解决社会问题的效能（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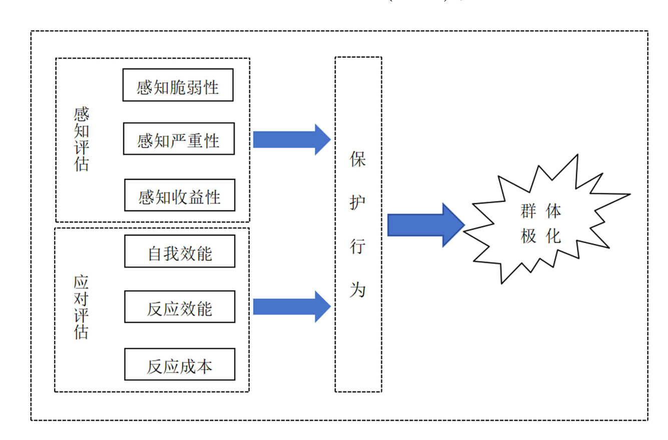


图 1　保护动机理论模型

Fig.1　The model of protective motivation theory

2.1.2　圈群结构理论

圈群结构理论是一种研究社会网络和社会关系的社会科学理论，它用圈群模型来描述社会关系网络的结构。圈群结构理论在 20 世纪 50 年代由美国社会学家文森特·费恩构建，他的理论被称为“三级社会结构”理论。网络圈群是以兴趣和情感等作为纽带形成的网络趣缘共同体[27]。现实社会中，由于时空的限制，个体很难找到适合自己的社交圈，而虚拟空间的便捷性和超时空性能够迅速满足个体的社交需求，通过自身兴趣爱好、职业范围、地域等特征为自己量身打造出个性化信息服务中心，在所选择的圈群内通过互动实现信息交流，满足自身精神活动的需求，由此圈群结构由线下延伸到了线上。网络“圈群”具备独特的“点线面”结构[28]，“点”即信源节点，“点”与“点”之间的连线代表网络“圈群”成员之间的信息传播路径即“关系”，“线”与“线”的交缠构成“面”，即网络“圈群”内部的网状关系结构。网络圈群形成过程中成员的派别性、媒体的共振效应以及圈群内部的复杂性，共同促成了虚拟场域群体极化现象的发生。

2.2　研究假设

前文基于保护动机理论提取出了舆情风险感知的 3 个维度，分别是风险事实感知、风险损失感知、风险反应行为感知。关于风险感知对群体极化的影响，GARRETSON 和 CLOW 指出，在危机事件中个体面对网络释放的各种信息会感知到各种风险，感知风险越高，预期损失概率愈大，个体参与集群意愿愈加强烈[29]，相似的群体中呈现内部信息碰相互碰撞的现象，在这种碰撞中内部成员在群体中达成共识，就会逐步形成群体极化，引发讨论事件的发酵和膨胀；借助社会燃烧理论，把社会媒体夸大性的报道当作社会风险心理放大的“助燃剂”，风险感知越大，群体极化的程度越高[30]；与正面情绪相比，负面情绪更有可能引起网络群体极化[31]。一般而言，个体优先的行为策略是避免风险，故个体感知到的风险越高，估计发生损失的概率越大，越会影响其参与信息传播放大的意愿。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H1：风险感知对群体极化具有正向显著影响；

H1a：风险事实感知对群体极化具有正向显著影响；

H1b：风险损失感知对群体极化具有正向显著影响；

H1c：风险反应行为感知对群体极化具有正向显著影响。

群体压力论指出，群体压力能够影响受众对媒介内容的接受，网络圈群作为群体极化产生的重要情境因素，群体对意见的认同会强化个体关于此意见的信心，媒介信息一旦不符合群体的利益与规范时，便会受到群体的抵制，形成极化心理[32]。群体极化受到风险感知影响的同时，会在圈群效应下达到效用最大化。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H2：网络圈群对群体极化具有正向显著影响；

H2a：网络圈群中的“点”对群体极化具有正向显著影响；

H2b：网络圈群中的“线”对群体极化具有正向显著影响；

H2c：网络圈群中的“面”对群体极化具有正向显著影响；

H3：风险感知对网络圈群具有正向显著影响；

H3a：风险事实对网络圈群具有正向显著影响；

H3b：风险损失对网络圈群具有正向显著影响；

H3c：风险反应行为感知对网络圈群具有正向显著影响；

H4：网络圈群在多维度风险感知和群体极化间起中介作用。

综合上述研究假设，构建出网络圈群背景下个体风险感知与群体极化关系的理论模型，如图 2 所示。

3 数据收集与统计分析

3.1 案例选取

“6.10”打人事件发生后，网络焦点偏移，网民关注点转移到性别对立，尤其是女性网民开始对男性的声讨，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偏移。本研究选取微博上2022 年 6 月 10 日到 17 日的有关数据，根据词云图显示（图 3），“妇女”“女孩”等词出现次数较多，同时“弱女子”“女拳”等性别色彩的词也明显呈现了出来，对该事件的关注从黑恶势力转变到了性别上。从整体来看，“6.10”打人事件不仅呈现出热度高、舆论影响大等现象，而且引发了性别议题、社会安全、黑恶势力等一系列问题的讨论，女性群体极化现象显著，因此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图 3 2022 年“6.10”打人事件微博高频词

Fig.3 High-frequency words of a hitting event on June 10, 2022 in micro-blog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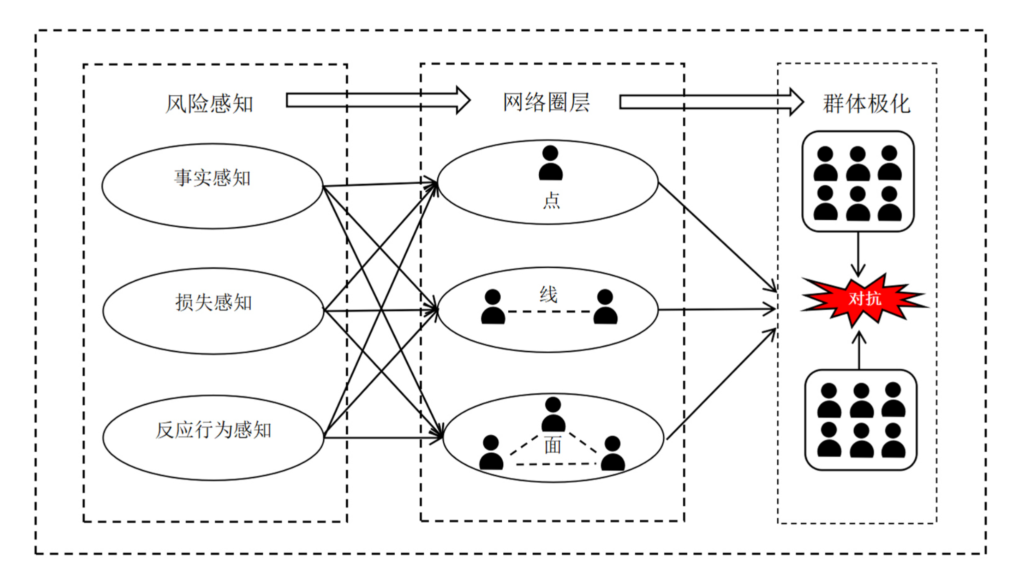


图 2 网络圈群背景下风险感知与群体极化关系的理论模型

Fig.2 A theoretical model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isk perception and group polarization for network circle groups

DOI：10.13998/j.cnki.issn1002-1248.23-0801

3.2 问卷设计

根据本文的研究对象，选择“6.10”打人事件为例，广泛借鉴相关研究的已有量表，得到问卷的测量指标如表 1 所示，并面向有圈群的女性和无圈群的女性进行问卷调查，通过两组数据的对比研究希望能凸显出圈群在群体极化中的作用。面向女性圈群的问卷主要通过 QQ、微信、豆瓣等平台上的女性群聊或者女性话题小组发布（前提为组群内曾讨论过该事件）；面向无圈群的女性则通过互联网平台随机发放。问卷主要包括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女性网民的基本状况，如女性网民的年龄阶段、受教育程度等；第二部分是女性网民对“6.10”打人事件了解情况，主要包括对该事件的网络关注度和参与度、事件观点、事件产生的网络现象等。问卷除年龄、受教育程度等人口统计特征外，其余题项均采用 Likert 五级量表。本研究在考虑目标群体时，只调查女性网民，因为“6.10”打人事件热度期间所引发的有关女性安全的舆论最多，且本研究的切入点为圈群效应，因此特意选取随机女性和圈群女性进行对比调查研究。

3.3 数据收集与统计分析

本问卷通过问卷星平台进行发放，问卷指定由女性网民进行填写。面向无圈群女性的问卷共发放问卷 600 份，收回并筛选出有效问卷 554 份，有效样本为 92.33%。面向女性圈群的问卷共发放问卷 600 份，收回并筛选出有效问卷 505 份，有效样本为 84.16%。

3.3.1 女性用户基本情况

描述性统计包括年龄和受教育程度。在两组调查数据中，调查对象中年龄阶段主要集中在青壮年，占比分别达 68.24%和 77.02%（图 4）；在受教育程度方面，样本主要集中在本科及以下学历，占比分别达

表 1 问卷测量指标

Table 1 Questionnaire measurement indicators

研究维度	变量	可测变量
网络圈群	“点”	信息源、意见领袖、信息扩散者
	“线”	媒介技术、情感共鸣、趣缘关系
	“面”	扁平化、平等化、后中心化
风险感知	风险事实	事件类型、利益关涉范围、信息饱和度
	风险损失	损失的严重性、损失的可控性、损失的补偿性
	风险反应行为	信息交互、政府回应、媒体共振
群体极化	群体极化	信息茧房、情绪宣泄、群体对抗、线下行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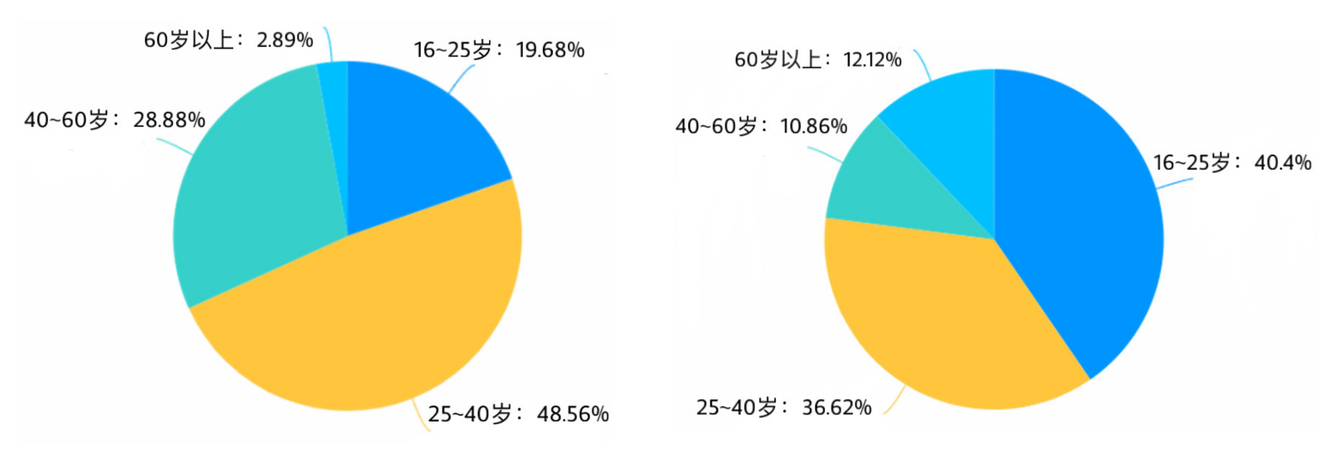


图 4 有圈群（左）和无圈群（右）女性用户年龄分布图

Fig.4 Age distribution map of circled groups (left) and uncircled groups (right) about female users

95.85%和96.72%（图5），接受研究生教育的人占比较少，整体符合实际情况。

3.3.2 女性用户对“6.10”打人事件的了解情况

女性用户对“6.10”打人事件的了解情况主要包括对该事件的关注度、参与度和观点看法等3个方面。(在以下陈述中，前者数据为面向有圈群的女性，后者数据为面向无圈群的女性。)

（1）关注度。根据两组数据得出，83.93%和55.81%的被调查者同意或者很同意在在社交平台上见到过有关“6.10”打人事件的相关内容或报道，社交平台的推送是大量网民们关注的前提和基础；75.63%和54.04%同意或者很同意在社交平台上特别关注“6.10”打人事件；77.62%和50.82%的用户同意或者很同意其对事件的来龙去脉十分清楚。因此，绝大多数女性用户在社交媒体上对该事件的关注度较高，且有圈群的女性用户对事件的关注度要高于无圈群的女性用户，因此本次调查对象符合研究需要。

（2）参与度。两组样本数据中，82.13%和54.8%的被调查者同意或者很同意社交平台上发表过有关“6.10”打人事件的看法或评论，以及有70.58%和57.32%的被调查者同意或者很同意自己在社交平台上转发过有关“6.10”打人事件。根据结果分析得出，绝大多数女性用户都参与了有关该事件的讨论，事件参与度占比人数高，且有圈群的女性用户对事件的参与度要高于无圈群的女性用户。

（3）观点看法。调查数据显示，73.65%和55.81%的女性用户同意或者很同意“6.10”打人事件涉及到所有女性的安全问题，85.99%和53.98%的女性用户同意或者很同意该事件的发生完全是男性加害者的错，81.04%和52.51%的用户意或者很同意在“6.10”打人事件热度期间总看到关于该事件男性和女性的观点对立。通过这3组数据得出，由于该事件的利益关涉对象，形成了女性圈群效应，并且圈群内部意见统一。

本次样本主要特征包括：受教育程度主要为本科及以下的年轻群体；有圈群的女性用户对事件的关注度和网络参与度更高；女性圈群内部观点统一。因此，样本符合本研究的需要。

3.4 信效度分析

利用问卷星平台对两组样本数据进行信效度分析，各维度检验数值如表2和表3所示。克朗巴哈系数的系数取值范围在0~1之间，检验结果系数值越高，信度越高。一般认为信度系数在0.6以下的，需要重新设计问卷或者重新收集样本数据进行二次分析；系数值在0.6~0.7之间为可信；系数值在0.7~0.8为比较可信；系数值在0.8~0.9之间为很可信；数值在0.9~1之间为十分可信。根据计算结果得知，面向圈群的各维度变量的克朗巴哈系数整体上均大于0.7，说明问卷具有良好的可靠性；面向无圈群的各维度变量的克朗巴哈系数整体上在0.6~0.7之间，说明问卷具有较好的可靠性及稳定性。KMO指标在[0,1]的数值范围内，如果KMO指数的数值较大，则说明该调查样本适宜进行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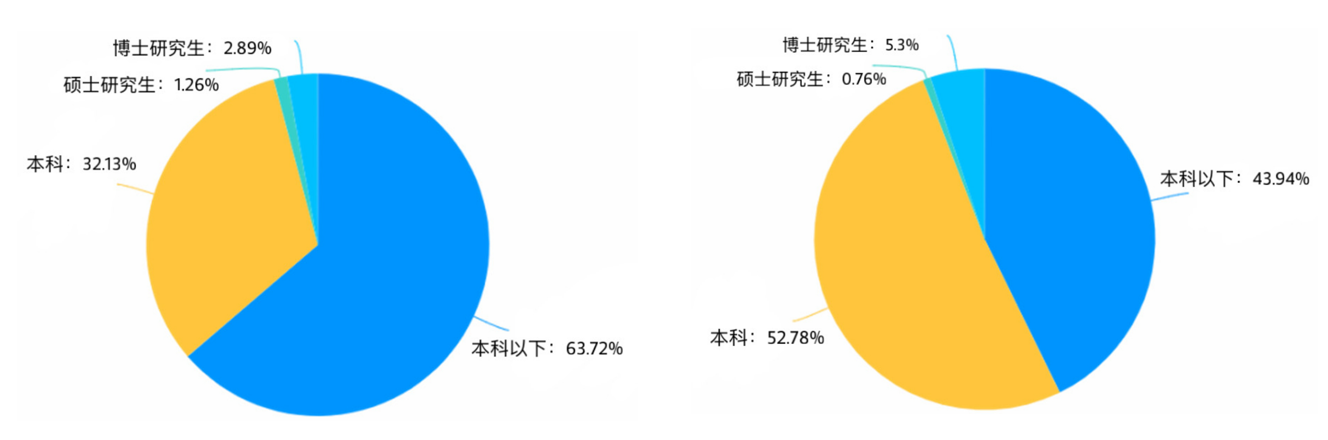


图5 有圈群（左）和无圈群（右）女性用户学历分布图

Fig.5 Education background distribution map of circled groups (left) and uncircled groups (right) about female users

DOI：10.13998/j.cnki.issn1002-1248.23-0801

表 2 面向女性圈群的问卷信效度检验结果

Table 2 Results of questionnair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test for female circle groups

量表	变量	信度检验		效度检验		项数
		信度系数	信度组合系数	KMO 值	Bartlett 检验	
网络圈群	“点”	0.781	0.898	0.946	0.000	3
	“线”	0.816				3
	“面”	0.735				3
风险感知	风险事实	0.699	0.896	0.946	0.000	3
	风险损失	0.767				3
	风险反应行为	0.764				3
群体极化		0.786	0.786	0.782	0.000	4
总量表		0.955	0.955	0.984	0.000	22

表 3 面向随机女性的问卷信效度检验结果

Table 3 Results of questionnair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test for randomly selected women

量表	变量	信度检验		效度检验		项数
		信度系数	信度组合系数	KMO 值	Bartlett 检验	
网络圈群	“点”	0.697	0.877	0.927	0.000	3
	“线”	0.741				3
	“面”	0.701				3
风险感知	风险事实	0.686	0.869	0.927	0.000	3
	风险损失	0.698				3
	风险反应行为	0.722				3
群体极化		0.766	0.766	0.780	0.000	4
总量表		0.945	0.945	0.975	0.000	22

子分析。从效度分析的结果来看，两组数据中各维度KMO 系数均大于 0.7，该问卷的效度较高且 Bartlett 数值具有显著的水平，因此可以表明因子测度量之间是独立的。

4 结构方程模型实证研究

4.1 模型适配度检验

本研究利用 AMOS 软件将前期获得的数据与构建的概念模型进行适配度检验，经检验，模型拟合后的适配度尚未达标，因此需要进一步修正模型以提高模型适配度。一般来说，潜变量对数据要求更为严格，因此，在调整模型时，把原来的潜变量设置为了显变量。除此之外，发现风险事实、风险损失好与风险反应行为 3 个维度之间存在相关关系，于是将其三者之间建立相关关系进行修正，最终得到合格的模型（图 6）及拟合指标。

本研究还选取了 IFI、TLI、CFI、NFI 四个指标的检验结果，发现两组样本中均有 3 个指标的数值均达到了 0.9 以上的优秀数值。因此，综合本次的分析结果，此模型具有较好的适配度。

由表 4 得知，模型的多项拟合指数均达到了良好的水平以上，因此本次两组样本数据与模型拟合程度较好，研究假设得到较好检验。

4.2 研究假设检验分析

4.2.1 主效应检验

本文采用 AMOS26.0 的自动计算功能对两组数据

表 4 模型适配度检验

Table 4 Model fitness test

指标	参考标准	有圈群的实测结果	无圈群的实测结果
IFI	>0.9 为优秀，>0.8 为良好	0.991	0.985
TLI	>0.9 为优秀，>0.8 为良好	0.803	0.897
CFI	>0.9 为优秀，>0.8 为良好	0.990	0.985
NFI	>0.9 为优秀，>0.8 为良好	0.991	0.984

分别进行计算，P 代表着显著性水平，当 $P<0.05$ 则代表达到了显著性水平，当 $P<0.01$ 时显示为“***”，当 $P>0.01$ 时，P 值通过数值显示出来，如表 5 和表 6 所示。

对比表 5 和表 6 的数据可知，面向圈群的调查数据中所有路径的 P 值都在 0.05 以下，都达到了显著性水平，证明了圈群的存在以及对群体极化的影响；而面向随机女性的调查数据中“点”到群体极化呈现负相关，且“线”和“面”到群体极化的路径不显著。凯斯·桑斯坦认为群体极化是团队成员本来有某种偏向，在群体讨论之后群体成员朝偏向的方向继续移动，最后形成极端观点的现象[2]。散落在互联网的无圈群个体不易参与群体讨论，因此她们会始终保持自己的想法，不会朝任何群体偏向的方向移动，零散在互联网的个体越多，拥有不同的认知则越多种，群体极化则更不容易形成。综上可以表明，随机女性群体中不存在圈群效应，也不易形成群体极化；而女性圈群中则存在着明显的圈群效应，且圈群效应的存在对群体极

表 5 有圈群的结构方程模型标准化路径系数

Table 5 Standardized path coefficients for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 about circled groups

路径	Estimate	S.E.	C.R.	*P*
点<---风险事实	0.242	0.041	6.337	***
线<---风险损失	0.391	0.036	10.364	***
线<---风险反应行为	0.315	0.034	8.670	***
面<---风险事实	0.222	0.042	5.339	***
面<---风险损失	0.338	0.043	7.424	***
面<---风险反应行为	0.299	0.040	6.826	***
点<---风险损失	0.344	0.042	8.221	***
点<---风险反应行为	0.314	0.040	7.809	***
线<---风险事实	0.232	0.035	6.729	***
群体极化<---点	0.173	0.048	4.271	***
群体极化<---风险事实	0.074	0.048	1.996	0.046
群体极化<---线	0.188	0.048	5.026	***
群体极化<---风险损失	0.160	0.052	3.723	***
群体极化<---风险反应行为	0.163	0.047	4.403	***
群体极化<---面	0.211	0.057	4.720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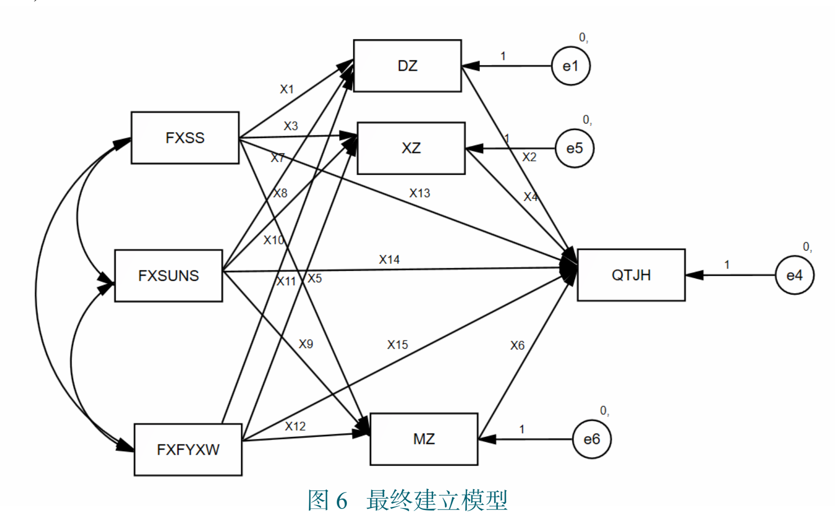


图 6 最终建立模型

Fig.6 The final model

* 注：DZ 为显变量“点”，XZ 为显变量“线”，MZ 为显变量“面”，FXSS 为显变量“风险事实”，FXSUNS 为显变量“风险损失”，FX-FYXW 为显变量“风险反应行为”，QTJH 为显变量“群体极化”，e1、e4、e5、e6 为残差变量

DOI：10.13998/j.cnki.issn1002-1248.23-0801

表 6 无圈群的结构方程模型标准化路径系数

Table 6 Standardized path coefficients o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 about uncircled groups

路径	Estimate	S.E.	C.R.	*P*
点<---风险事实	0.552	0.095	7.271	***
线<---风险损失	0.508	0.079	7.485	***
线<---风险反应行为	0.333	0.044	5.382	***
面<---风险事实	0.415	0.096	6.306	***
面<---风险损失	0.353	0.55	6.464	***
面<---风险反应行为	0.341	0.049	5.352	***
点<---风险损失	0.516	0.077	7.150	***
点<---风险反应行为	0.663	0.054	8.125	***
线<---风险事实	0.373	0.057	6.517	***
群体极化<---点	-2.396	0.710	-3.131	0.002
群体极化<---风险事实	1.324	0.445	3.385	***
群体极化<---线	0.236	0.444	0.456	0.649
群体极化<---风险损失	0.734	0.705	1.034	0.301
群体极化<---风险反应行为	1.629	0.589	4.627	***
群体极化<---面	1.125	0.920	0.972	0.331

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通过分析有圈群的相关数据，得到了以下 3 个方面研究结果。

假设 H1 风险感知（风险事实感知、风险损失感知、风险反应行为感知）对网络群体极化现象的形成具有显著正向影响。面对突发公共安全事件时，行为主体会对风险事件形成自身的认知和情绪，当小范围的认知和情绪逐步引起他人的认同及附和时，就会形成风险认知的舆论圈，使得风险感知由个体向群体扩散，原本分散的个人感知就会集合形成群体的共同认知，出现群体极化现象[33]。首先，舆情事件本身的性质，如利益关涉范围、信息饱和度以及可控性会决定网民的风险感知大小。利益关涉范围越大、事件关键信息越缺失、事件发生的控制难度越高往往会加大公众的风险感知，风险感知越高，群体极化现象越显著。其次，风险损失的严重性以及补偿性会影响风险感知的大小，当由事件造成的严重损失得不到国家或者组织的补偿或者赔偿，就会放大风险，进而提高自身的风险感知，最终形成群体极化。最后，网民间的信息频繁交互，涉事主体采取不当解决方式，媒体的大量报道以及次生舆情的相继出现等一系列风险反应行为的相互交织，也必然提升网民的风险感知，出现群体极化现象。在多维度的风险感知中，风险事实感知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 0.074，风险损失感知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 0.160，风险反应行为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 0.163，因此，风险感知中，风险反应行为对群体极化的影响最大。可能的解释是，即使民众意识到事件的原因、性质，但是更愿意把它们归结为社会原因和政府原因，期待政府能站在公平秤的中间处理问题，因此政府所采取的应对措施比个体的行为更加重要，一旦处置不当，民众的情绪便会迅速点燃，并想通过自身的号召力和影响力形成群体力量施压以找到减弱或者规避风险的方法。

假设 H2 网络圈群（点、线、面）对网络群体极化现象的形成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由于网络圈群主体的复杂性、圈群间群体的派别性、网络圈群技术的助推性以及网络圈群间文化的异质性，导致舆情传播中因圈群间主体观点相斥，在不同圈群的互动中产生冲突而形成群体极化[18]。网络圈群中的“点”即个体。个体对舆情事件在社交平台上进行探讨，搜寻与自己观念相似的其他个体，并通过线上交流及线下活动增强群体联系。圈群个体间的联系越紧密，群体极化现象越显著。网络圈群中的“线”即媒体技术。媒体技术的提升加快了网络信息的流动速度，为具有相同兴趣爱好、认知观念的个体迅速集聚提供条件。然而，当下媒体技术的推送机制（精准推送用户爱看的内容）导致个体对某一领域内的信息认知虽然全面，但对此领域之外的其余信息则一无所知，陷入“信息茧房”的陷阱中，最终会导致圈群内部的观点更极端，群体极化现象越显著。网络圈群中的“面”即由个体、媒介、事件构成的平面。舆情事件的用户关注度越高，社交平台的传播速度越快，平台的共振机制越高效，不同圈群主体集聚速度越快，群体极化的发生概率必然越高。在网络圈群的 3 个维度中，“点”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 0.173，“线”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 0.188，“面”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 0.211，可以得出，网络圈

群的“面”对群体极化的正向影响最高。可能原因在于，虽然个体对信息的选择性差异，最终导致群体极化的产生，但是如果仅仅依靠个人力量最终还是难以形成群体极化；同样，无论是传播技术还是传播方式的发展虽然会引起群体极化，但是其发挥的仅仅是助推作用；而群体极化的发生一定是所有因素共同交织环境下的结果，舆情事件的出现，不同个体的价值观差异而分离出多个圈层，再加上媒体技术的推波助澜共同催促着群体极化的萌芽。

假设 H3 风险感知对网络圈群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风险感知存在着个体偏好差异[34]。风险社会下，人类社会正处于多种风险要素交织共生、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大环境中，各种风险接踵而至，有人关心食品安全、卫生安全、公共安全等安全风险，有人关心土壤污染、水污染、空气污染等环境风险。正是由于个体的认知偏好差异，让个体在虚拟舆论场中寻找着与自己认知相同的群体，形成了多种表现形式的网络圈层，并原意从群体成员讨论的大量信息中获取解决问题的办法。当风险感知越高，个体在网络上“抱团”的速度越快，网络圈群形成速度越快，形式越多。

4.2.2　中介效应检验

中介效应模型可以分析自变量对因变量影响的过程和作用机制[35]。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学术界存在着两种检验方法，一种称为 Sobel 检验法，另外一种称为 Bootstrap 检验法。本研究基于 Amos26.0 软件，采用 Bootstrap 检验法对模型中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如果 Percentile 置信区间均不包含 0，说明网络圈群的中介效应存在；反之，网络圈群的中介效应不存在。

对数据进行计算，发现模型中的中介效应均通过检验，如表 7 所示，因此网络圈群的中介效应存在。公众的风险感知偏差促使其融入与自身认知相同的圈群中。在网络圈群中，个体化消失，为了维护本圈群的利益和声誉，不同群体在网络战场上相互争辩与讨伐的过程中，群体内部的极化程度越来越显著，最终发生对立群体间的对抗，甚者由线上的唇舌之战转变为线下抗争。因此，在风险感知与群体极化的生成路径中，网络圈群现象在中间充当了“催化剂”，让群体极化现象更进快一步发生。

表 7　网络圈群对风险感知和群体极化的中介效应结果

Table 7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network circle groups on risk perception and group polarization

路径	Estimate	Lower	Upper	*P*
点<---风险事实	0.242	0.162	0.307	0.023
群体极化<---点	0.173	0.085	0.266	0.011
线<---风险事实	0.232	0.142	0.293	0.018
群体极化<---线	0.211	0.114	0.309	0.005
面<---风险事实	0.222	0.132	0.283	0.020
群体极化<---面	0.188	0.107	0.278	0.006
点<---风险损失	0.344	0.273	0.436	0.006
线<---风险损失	0.391	0.307	0.481	0.006
面<---风险损失	0.338	0.256	0.447	0.007
点<---风险反应行为	0.314	0.241	0.394	0.005
线<---风险反应行为	0.315	0.223	0.378	0.019
面<---风险反应行为	0.299	0.197	0.386	0.010
群体极化<---风险事实<---点	0.042	0.021	0.070	0.014
群体极化<---风险事实<---线	0.049	0.024	0.075	0.007
群体极化<---风险事实<---面	0.042	0.021	0.065	0.008
群体极化<---风险损失<---点	0.060	0.030	0.092	0.010
群体极化<---风险损失<---线	0.083	0.045	0.131	0.003
群体极化<---风险损失<---面	0.063	0.039	0.107	0.004
群体极化<---风险反应行为<---点	0.054	0.029	0.093	0.004
群体极化<---风险反应行为<---线	0.067	0.034	0.104	0.007
群体极化<---风险反应行为<---面	0.056	0.031	0.096	0.004

5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基于保护动机和圈群结构理论，根据“6.10”打人事件的两组对比调研数据建立结构方程模型，证明了网络圈群的存在对群体极化的生成具有促进作用，同时探究圈群效应下多维度感知风险对群体极化的影响和作用路径，具体结论如下。

（1）网络圈群内观点同质化程度高，圈群效应显著。在无圈群环境下，个体信息之间难以得到交互，导致单个个体的行为模式、思想态度等不易受到其他个体的影响，因此，随机个体的认知和观点难以达到统一。而在有圈群的环境下，由熟人关系、次生关系、

DOI：10.13998/j.cnki.issn1002-1248.23-0801

共同偏好等纽带聚合而成的组织形态具有较强的同质性，基于一定的同质性，圈群内个体的思想或行为容易受到其他成员的无形影响，成员之间也容易就某一观点达成一致意见，形成情感上的共鸣，由此拥有相似的心理特征，出现较明显的圈层效应。

（2）多维度风险感知对群体极化现象的形成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当民众意识到某一事件与自身当下利益或者未来利益息息相关时，会采取各种方法尽量避免出现利益受损，在网络上则表现为寻找与认知或者价值观念相同的网友进行集群，并希望从中找出解决方法避免损失。在风险事实、风险损失以及风险反应行为 3 个子维度中，风险反应行为对群体极化现象的正向影响更加显著。

（3）网络圈群对群体极化现象的形成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网络圈群是由相同或者相似的兴趣爱好、价值观念等符号作为媒介构建成的一个个网络部落，每个部落内部有一致的共识，且难以接受本圈群以外的观点，导致各部落间的冲突和矛盾越发凸显，产生群体极化行为。在“点”“线”“面”3 个圈群子维度中，“面”对群体极化现象的正向影响更加显著。

（4）网络圈群在多维度风险感知和群体极化间起中介作用。网络圈群的出现让个体有了精神归属地，圈内民众不愿意听取本圈群以外的观点，具有独立认知的小部分人由于害怕自己被圈群边缘化甚至“踢出群聊”，会尽量对自身的不同观点保持沉默，进而出现沉默的螺旋，圈内信息同质化严重并造成信息闭塞。当个体感知到风险时，会首先在圈内寻找与自己相同的观点或者希望有人认同自己的观点。在群体的交流和认同作用下，圈层内部同质化信息不断强化，最终导致群体内部观点极端化，一旦遇到与本圈层不符合的观点，就极易产生群体对抗。

参考文献：

[1] 王雄, 刘康. 意识形态安全视域下网络群体极化的正负效应及其治理路径[J]. 山东社会科学, 2023(4): 153-160.
WANG X, LIU K. Positive and negative effects of network group polarization and its governance pat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deological security[J]. Shandong social sciences, 2023(4): 153-160.

[2] 唐云锋, 刘涛, 王艳艳. 网络圈层化、微博舆情传播与虚拟场域群体极化[J]. 浙江社会科学, 2022(7): 78-84, 159.
TANG Y F, LIU T, WANG Y Y. Network stratification, weibo public opinion dissemination and group polarization in virtual field[J]. Zhejiang social sciences, 2022(7): 78-84, 159.

[3] 胡联合. 群体性事件的演化机理及其启示[J]. 探索, 2017(1): 124-133.
HU L H. Evolution mechanism of group events and its enlightenment[J]. Probe, 2017(1): 124-133.

[4] 匡文波. 自媒体时代圈群文化新特征[J]. 人民论坛, 2020(S2): 151-153.
KUANG W B. New characteristics of circle culture in the era of media[J]. People's tribune, 2020(S2): 151-153.

[5] 段洪涛. 网络圈群的舆论传播机理 [J]. 传播力研究, 2020, 4(7): 184-185.
DUAN H T. Public opinion communication mechanism of network circle group[J]. Research on transmission competence, 2020, 4(7): 184-185.

[6] 叶荔辉. 高校“网络圈群”舆论引导的困境及路径[J]. 思想教育研究, 2018(1): 135-138.
YE L H. The predicament and path of public opinion guidance of "network circle group"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J]. Studies in ideological education, 2018(1): 135-138.

[7] 杨美新, 郭燕萍. 网络圈群中的主流意识形态认同: 价值、藩篱与实现路径[J].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24(6): 154-161.
YANG M X, GUO Y P. Mainstream ideological identity in the network circle group: Value, barrier and realization routine[J]. Journal of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21, 24(6): 154-161.

[8] 穆冬霞. 基于网络圈群的高校网络舆情治理研究[J]. 新闻爱好者, 2023(6): 90-92.
MU D X. Research on university network public opinion governance based on network circle group[J]. Journalism lover, 2023(6): 90-92.

[9] 孙旭红, 顾琪.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传播的现实挑战及优化策略——大学生网络圈群视角[J]. 高校教育管理, 2023, 17(2): 35-

43.

SUN X H, GU Q. Practical challenges and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of discourse dissemination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perspective of college students' online circles [J].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management, 2023, 17 (2): 35-43.

[10] 刘雨, 陈坤. 智媒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发展的算法嵌入风险及其应对[J]. 中学政治教学参考, 2022(48): 52-55.

LIU Y, CHEN K. Algorithm embedding risk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discourse development in the age of intellectual media and its countermeasures [J]. Teaching reference of middle school politics, 2022(48): 52-55.

[11] 玄铮. 大学生网络圈群化及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研究[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22(18): 56-59.

XUAN Z. Research on the grouping of college students' network circles and the network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J]. The party building and ideological education in schools, 2022(18): 56-59.

[12] 陈坤, 刘雨. 网络圈群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破圈困境与路径选择[J]. 理论导刊, 2022(7): 112-116.

CHEN K, LIU Y. The circle-breaking dilemma and path choi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discour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twork circle group[J]. Journal of socialist theory guide, 2022(7): 112-116.

[13] 阎国华, 韩硕. 网络圈群下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现实境遇与促进策略[J]. 探索, 2022(4): 171-184.

YAN G H, HAN S. The realistic situation and promotion strategies of the mainstream ideological identity under the network circle group[J]. Probe, 2022(4): 171-184.

[14] 洪晓楠, 刘媛媛. 全媒体时代网络意识形态风险的基本特征、现实表现与治理策略[J]. 思想教育研究, 2023(5): 69-75.

HONG X N, LIU Y Y.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reality manifestations and governance strategies of Internet ideological risks in the all-media era[J]. Studies in ideological education, 2023(5): 69-75.

[15] WILLIAMS H T P, MCMURRAY J R, KURZ T, et al. Network analysis reveals open forums and echo chambers in social media discussions of climate change [J].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2015, 32: 126-138.

[16] DONG Y C, ZHAN M, KOU G, et al. A survey on the fusion process in opinion dynamics[J]. Information fusion, 2018, 43: 57-65.

[17] SALZARULO L. A continuous opinion dynamics model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meta-contrast[J]. JASSS, 2006, 9(1): 65-93.

[18] 程亮亮. 丁香小慧事件与网民的“群体极化”倾向[J]. 传媒观察, 2007(10): 17-18.

CHENG L L. Lilac Xiaohui incident and the "group polarization" tendency of Internet users[J]. Media observer, 2007(10): 17-18.

[19] 张孝廷, 赵宬斐. 网络集群效应下的执政风险及其规避[J]. 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2, 34(4): 105-109, 115.

ZHANG X T, ZHAO C F. The ruling risk and its avoidance under the network cluster effect[J]. Journal of Ningxia university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2, 34(4): 105-109, 115.

[20] WOJCIESZAK M. Don't talk to me: Effects of ideologically homogeneous online groups and politically dissimilar offline ties on extremism[J]. New media & society, 2010, 12(4): 637-655.

[21] GARCIA D, ABISHEVA A, SCHWEIGHOFER S, et al. Ideological and temporal components of network polarization in online political participatory media[J]. Policy & internet, 2015, 7(1): 46-79.

[22] 申金霞, 万旭婷. 网络圈层化背景下群体极化的特征及形成机制——基于“2·27 事件”的微博评论分析[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21, 43(8): 55-61.

SHEN J X, WAN X T.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formation mechanism of group polarization in the context of network stratification: An analysis of Weibo comments based on the "February 27 Event"[J]. Modern communication(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2021, 43(8): 55-61.

[23] 金冬雪, 夏一雪, 朱攀龙. 情绪演化视角下网络舆情群体极化动力学机理研究[J]. 情报科学, 2023, 41(3): 57-65.

JIN D X, XIA Y X, ZHU P L. The mechanism of network public opinion group polarization dynam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otional evolution[J]. Information science, 2023, 41(3): 57-65.

[24] TORNBERG P, ANDERSSON C, LINDGREN K, et al. Modeling the emergence of affective polarization in the social media society [J]. PLoS One, 2021, 16(10): e0258259.

[25] 李华, 孔娇. 基于文本挖掘的城市景区密集人群风险感知[J]. 中

DOI：10.13998/j.cnki.issn1002-1248.23-0801

国安全生产科学技术, 2022, 18(5): 40-46.

LI H, KONG J. Risk perception of dense crowd in urban scenic spots based on text mining[J]. Journal of safet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22, 18(5): 40-46.

[26] ZHOU Z F, LIU J H, ZENG H X, et al. How does soil pollution risk perception affect farmers'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 The role of income level[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020, 270: 110806.

[27] 卞婧钰. 新闻的社交化传播研究——以抖音中的主流媒体为例[D]. 呼和浩特: 内蒙古大学, 2022.

BIAN J Y. Social dissemination of news[D]. Hohhot: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2022.

[28] 孙雅文. 网络“圈层化”影响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优化研究[D]. 济南: 山东大学, 2021.

SUN Y W. Research on optimiz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circle-stratification[D]. Jinan: Shandong University, 2021.

[29] 吴彩虹, 卿再花. 网络群体极化事件风险放大的心理分析与治理策略[J].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学报, 2021, 37(5): 99-109.

WU C H, QING Z H. Psychological analysis and management strategy of network group polarization event risk amplification[J]. Journal of Hun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2021, 37(5): 99-109.

[30] 彭国超, 程晓. 热点事件中社交媒体群体极化形成机理研究[J]. 信息资源管理学报, 2023, 13(2): 42-52.

PENG G C, CHENG X. Research on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social media group polarization under hot events[J]. Journal of information resources management, 2023, 13(2): 42-52.

[31] 钟瑛, 朱雪. 风险社会中主流媒体调适社会情绪的机制构建[J]. 内蒙古社会科学, 2020, 41(4): 185-191.

ZHONG Y, ZHU X.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mechanism of mainstream media adjusting social mood in risk society[J]. Inner Mongolia social sciences, 2020, 41(4): 185-191.

[32] [美]凯斯·桑斯坦. 黄维明, 译. 网络共和国: 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CASS S. Cyber republic: Democracy in a cyber society[M].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3.

[33] 鲁良. 论失信行为影响下公众风险感知的演变[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21, 50(6): 107-113.

LU L. On the evolution of public risk perception influenced by dishonest behavior[J].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of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2021, 50(6): 107-113.

[34] 汪新建, 张慧娟, 武迪, 等. 文化对个体风险感知的影响: 文化认知理论的解释[J]. 心理科学进展, 2017, 25(8): 1251-1260.

WANG X J, ZHANG H J, WU D, et al. Cultural influences on individual risk perception: Cultural cognition theory's explanation[J].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17, 25(8): 1251-1260.

[35] 温忠麟, 叶宝娟. 中介效应分析: 方法和模型发展[J]. 心理科学进展, 2014, 22(5): 731-745.

WEN Z L, YE B J. Analyses of mediating effects: The development of methods and models[J].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14, 22(5): 731-745.

Influence of Risk Perception on Group Polarization in Network Circle Groups

WAN Xiaodie, XIA Yixue*
(Research Center of Network Public Opinion Governance, China People's Police University, Langfang 065000)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In social media, the complex phenomenon of group polarization caused by the effect of network circle groups has brought serious challenges to the guidance and governance of online public opinion.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influencing mechanism of multi-dimensional environmental risk perception on group polarization in the network circle groups, and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insights into the management of group polarization. [Method/Process] First, based on the protective motivation theory and the circle group structure theory, risk perception was divided into three dimensions: risk fact perception, risk loss perception and risk reaction behavior perception, and a network circle group was divided into three layers: point, line and structure. Based on this, a theoretical model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isk perception and group polariz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twork circle groups was constructed. Second, taking the "6.10" hitting event as an example, a questionnaire was designed to collect sample data, and two sets of comparative data were obtaine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randomly selected women and circled female groups, and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e data were tested and analyzed. Finally, Amos26.0 software was used to establish a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SEM) for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research hypothesis in this paper, and the Bootstrap method was used to test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network circle groups, revealing the effect of risk perception on group polarization in network circle groups. [Results/Conclusions] 1) Compared with the random female group, the degree of homogeneity in the network group is higher, and the circle group effect is significant. 2) Risk perception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formation of group polarization, in which the perceived risk response behavior has the most significant impact on group polarization. 3) Network circle groups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nfluence on the formation of group polarization, among which "structure" has the most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group polarization. 4) Network circle groups play a mediating role between multi-dimensional risk perception and group polarization. The research not only reveals the generation path of network circle groups and risk perception on group polarization and the key factors affecting the occurrence of group polarization from the theoretical level, but also provides directions for relevant departments to manage group polarization and reduce public risk perception. This study has several limitations. For instance, SEM model setting and questionnaire design depend on the subjective experience and theoretical assumptions of researchers, and may have selectivity bias, so the model setting in this paper is subjective to a certain extent.

Keywords: group polarization; risk perception; network circle group; structured equation model (SEM)